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九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錄

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江文漢（1）

帝国主义侵华縮影的怡和洋行……張　鋭（28）

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对外电信交通……荣宝濊（58）

有关上海兵工厂的回忆……陈修和（69）

永利硫酸鋁厂建厂經过……鄒秉文（95）

天津永明漆厂簡史……陈調甫（112）

丹华火柴公司沿革……張新吾（124）

书甲辰三暗杀案……章士釗（145）

书吳樾狙击五大臣事……章士釗（151）

黄埔革命同学会回忆……黄　雍（156）

黄埔同学会始末……曾扩情（169）

蔣介石对德国顧問的幻想……周亞卫（190）

关于"合步楼公司"的片断……黄培正（193）

局外局中人記……陈曾寿　陈曾植（195）

附注

对《有关上海兵工厂的回忆》一文的更正见《选辑》第四十三辑二七〇页

China

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

江 文 漢

基督教传入我国，前后已有一千三百多年。最早的是唐朝时（公元六三五年）传入我国的"景教"，其次是元代盛行的"也里可温教"，但后来均告失传。十六世紀末，天主教传入我国，一八〇七年，基督教（新教）也开始传来。鴉片战爭以后，它們都利用了不平等条約中所規定的传教特权，深入我国内地。从信徒人数来說，我国天主教徒要比基督教徒多；但是基督教（新教）很着重办"教育事业"和"社会事业"，因此基督教在我国的社会影响，可能比天主教还要大些。

过去，我国的天主教和基督教均被帝国主义所控制和利用，一貫是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侵略的先鋒和助手，我国广大人民称它們为"洋教"。到解放初期为止，它們的活动，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是分不开的。它們所办的一切事业，不管是披着什么"仁爱"、"友好"与"慈善"的外衣，都是帝国主义压迫和剝削我国人民的工具。国外派来的传教士，不管他們个人有什么伪善的表現，都是执行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帝国主义分子。多少年来，我国善良的信徒受了他們甜言蜜語和小恩小惠的矇蔽，以致是非不明，訛敌为友。我自己虽然并不是出身于基督教家庭，但从小就受着基督教的影响，从中学到大学，一直到留学美国，都受的是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大

China

学毕业以后，即参加"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以下簡称青年协会）工作，至今已整整三十年，現仅就基督教青年会（以下簡称青年会）在中国所进行的活动，根据个人的了解和經历，作一概括的叙述。

青年会的历史背景

青年会是英美資本主义制度下的产物，最初由英国商人乔治·卫良（George Williams，1821—1905）于一八四四年創立于伦敦。在英国工业革命时代，許多青年从农村流入城市，受着資本家的殘酷剝削和压迫，工作时間很长，居住条件很坏，生活极其苦悶，普遍地表示不滿和反抗，就在这种情况下，乔治·卫良邀集了十二位青年店員，組成第一个基督教青年会，声称以宗教活动来改善青年們的精神生活。这种組織很快得到資本家的支持，不到六七年，遍及英伦三島，随后还出現在欧美各国。一八九四年青年会举行五十周年紀念的时候，英国女王認为乔治·卫良有功，授以勛爵。

青年会虽然起源于英国，但在美国最为发达。一八五一年青年会从英国被介紹到美国以后，就逐漸从一种单純以宗教活动为号召的青年职工团体，发展成以"德、智、体、羣"四育为标榜的社会活动机构。并且在垄断資产阶級的扶持下，建立庞大的会所，聘用专职的干事。它就成为推行"美国生活方式"的重要力量。

一八五五年欧美各国的青年会在巴黎举行第一次的国际性会議，組成"基督教青年会世界协会"（World Alliance of the Y. M. C. A. S. 以下簡称"世界协会"），并于一八七八年正式設立办事处于日內瓦。青年会現已分布在六十几个国家和地区，会員約計一百七十多万人。世界协会的經济来源大部分来自美国；自一九二

China

七年以来，总干事的职位一直是由美国人担任，所以世界协会和美帝国主义的控制是分不开的。

十九世紀下半期，随着美国殖民主义势力向外扩张，美国教会上层曾掀起一个国外"传道"的热潮。他們号召美国的青年担負起"白种人的責任"（"White man's Burden"），立志去东方"未开化"的民族当中"传道"，要求"在这一輩子把整个世界基督化"（"Evangelization of the World in this Generation"），实际上是要在宗教的掩护下，使全世界美国化。一八八九年，美国和加拿大的青年会联合組成"北美协会"，美国垄断資本集团就是通过北美协会的头子穆德（John R. Mott, 1865—1955），把青年会向外扩张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他們在这些国家内，盖了許多美国式的会所，連建筑材料和室内設备都是从美国购置的；并派了許多美国干事，担任关鍵性的职务。按照北美协会所宣布的原則，沒有邀請，是不派遣干事到别的国家去的。从一八九五年起，他們派到中国来的美国干事，据說是根据在中国的传教士所出面敦請的。

穆德这个人

穆德是資本主义国家中一个頗有"名气"的人物。在美国垄断資本集团的直接扶持下，他在国际基督教界曾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他不但是北美协会的首脑，他在一八九五年发起組織"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World's Student Christian Federation，以下簡称"世界学盟"），还前后担任过这个組織的总干事与主席的职务。他在一九二六年到一九四七年充任青年会世界协会的会长，企图通过这些組織，将世界各国的知識青年統治在美国的影响之下。为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了进一步使美国在整个传教事业中取得全面控制的地位，配合美帝国主义独霸全世界的阴謀，他于一九二一年发起組織"国际基督教宣教协会"（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Council），又于一九四八年促成"世界基督教协会"（World Councial of Churches）的成立，由他分别担任主席与名誉主席。英美資本主义国家把穆德捧得很高，說他是什么"世界的公民"，"基督的大使"，"近代的保罗"（按：保罗是一世紀时将基督教从犹太传到外邦的使徒）。一九四六年十二月，我在美国紐約参加过为庆賀穆德获得"諾貝尔奖金"的大宴会，餐費每人十块美金，顧維鈞出席致祝詞。我們知道，諾貝尔是十九世紀末瑞典軍火商人靠剝削旧俄时代的巴庫油田而发了大財的。

我在紐約看到穆德时，他已經是八十一岁的人了。虽然名义上他已退休，但还是忙着策划一切。他对我說：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后，基督教面临着向世界扩张的大好机会。中国是具有很大的"战略"意义的；他到过中国六七次，他認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传教工区，四万万人的国家世界上只有一个，他不能"忘怀"中国。他告訴我美国的教会已經安排了一个战后世界性的"复原与扩张計划"。他主张派遣一百个年青的美国传教士到中国来做学生工作。一九四九年四月五日，上海解放前夕，他在去日本向日本天皇传教的途中，还特地在上海停留一天，召开一次传教士和中国教会領袖的特别会議，給大家在准备应付新局面到来时打气，并保証西方的教会継續支援中国教会。

从穆德的一生，我們可以看出他并不是什么奉了上帝的名，将福音传遍全世界，而是奉了美帝的指示，在煤油大王洛克菲勒、鋼鉄大王卡內基（Andrew Carnegie）、汽車大王道奇（C. H. Dodge）、百貨公司大王华納麦卡（John Wanamaker）等垄断資本集团的直

China

接扶持下，来对全世界进行所謂“精神扩张”。一九一〇年十月二十日，在穆德的策划下，北美协会在华盛頓白宮美国总統府举行了一次“青年会世界扩张的計划会議”，邀請了二百多位大資本家和社会名流参加。在会上，美国总統塔夫脫（William H.Taft）作了演講，其中有一段說：

> 通过我們的国务院，我們对其他所有国家在道德和其他方面的改进常表示同情和关怀。不过国务院在这方面所能做到的事受到了限制，而且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但是象基督教青年会这一类的运动，就不存在这样的限制。沒有人会設想到，我們到中国去設立基督教青年会是抱着任何侵略領土或干涉国家內政的野心的。但是有些基督教青年会的会員能够在他們本国的政府中取得重要的地位，我已經看到在中国和其他国家中，凡受过外国教育或其他因素影响的人，很容易获得重要地位。通过这些人，我們就能使这些落后国家最后接受我們的文明和道德标准”。（引自《穆德文集》«Addresses and Papers of John R. Mott», 1947, 第 3 卷，第 267—268 頁）

美国总統塔夫脫所說的这一段話，不打自招地說明了美帝国主义到中国来开办青年会的眞正目的。他們企图通过青年会的工作，散布亲美、崇美、恐美的毒素，培养一批买办奴才为它服务，麻痺中国人民的思想，掩盖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眞面目。

在那一次的白宮会議上，穆德提出了一个向远东和拉丁美洲扩张的預算，目标是一百五十多万美元，計划在十个国家建盖四十九座会所，其中有八所是在中国，包括青年协会大楼，共計四十多万美元，并在三年內派遣五十名美国干事到国外工作。这个預算当場就由到会的大資本家訂定三分之二，实际上，在提出預算以前，半数已由洛克菲勒承担了。

穆德环游世界六十八次，旅程达一百七十万哩（这还只是一九三四年的估計）。他的薪金、旅費和私人秘书的費用都是由几个大

資本家包干的。四十年中，他从美国垄断資本集团获得三亿美元，差不多所有的国际性基督教团体、許多重要的国际性基督教会議，以及好些为搜集情报而进行的"調查研究"，都是由他經手补貼的。所以有人說，"毫无疑問，穆德的捐款能力，对于教会合一运动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力"。

美国的大資本家还通过穆德投資三千五百万美元，在世界各国盖了七百多座青年会的会所，每年担負經常費五百万美元(这只是一九〇六年穆德所宣布的)。穆德曾公开地說，美国垄断資本集团是沒有灵魂的，其所以如此"慷慨"，并不是出于什么慈善的动机，而是因为青年会活动的效果完全使它們滿意(見《穆德文集》第3卷，第240頁)。穆德以能捐款自豪，并常吹嘘自己的一套庸俗的"金錢哲学"。他說："金錢不止是一种价值的标准和一种权力的工具，它本身就是积累的力量。它不止是大能，而且有时几乎是万能"(引自 Basil Mathews: «John R. Mott, World Citizen», 1934，第409頁)。

一九一三年(辛亥革命后不久)，美国总統威尔逊挑选穆德担任駐华大使，在他給当时国务卿白萊安（W. J. Bryan）的信中是这样說的：

> "我心中認为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現今在中国建設新中国的活动分子中有許多是青年会的会員，并且也有許多是在美国大学里受过教育的人，直接或間接的基督教影响是很显著地摆在前头，我无須說应当保持在那里。穆德先生是我素識的朋友，他所具政治家的品格，是和我所相識的任何人相等的。他非但对于中国的情形很熟悉，并且也为基督教世界里一切享有盛誉的人所信任。我想拍电报給他(因他在中国)，問他是否愿意留在那里代表美国作我們的駐华大使"(同前书，第436頁)。

China

穆德沒有接受这个委任，然而他并不是什么"超政治"的人。在威尔逊总統的委派下，他曾担任过两次美国政府特派使团的成員，一次是一九一六年去墨西哥，另一次是一九一七年五月(十月革命前夕)去俄国。美帝國主义就这样利用穆德的宗教外衣，对别国人民进行欺騙。十月革命以后，穆德对苏联表現出刻骨的仇恨。他曾說："我們积极地无条件地对現在的苏維埃政府在世界上所主张的一切，表示毫不妥协的宣战。"(引自《穆德文集》第 3 卷，第 336 頁)。

穆德慣于用帝国主义好战的字眼来描繪他的活动。他把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当作"教会的战場"和"战略据点"。他把事工計划称为"战略方針"。他把事工会議称为"軍事会議"。他把传教說成是"作战"、"占領"、"夺取"、"围攻"、"征服"。他的第一次环球旅行报告就采用了这样的书名：《征服世界的战略据点》(«Strategic Points in the World's Conquest», 1897)。他并不掩飾自己一貫执行美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实质。

关于北美协会对外扩张的計划，穆德很早就提出两个基本論点。按照他的說法，这个"战斗"要在两个"战場"上进行：一个是城市，因为城市是人口和各种势力集中的地方，也是政治、經济和教育的中心点，具有"战略"意义。他說："在所有的国家里，战場是在城市，城市是风暴的中心，也是人口、影响与机会的集中点。城市怎样，国家也就怎样。"(引自《穆德文集》第 3 卷，第 238 頁)。另一个"战場"是学生或知識青年。一八九九年穆德就指出："在非基督教国家里有两亿青年，这对基督教国家的青年会是一个何等巨大的責任！你們仔細想想，这意味着什么？这里关系着两亿青年的道德与精神命运，这里要求我們派人去到那些仍在等候上帝律法的三大洲和許多島屿……是的，我們所要做的是帮助教会来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陶鑄和訓練未开化种族的青年，为三分之二的人类奠定基督教文化的基石。”(引自《穆德文集》第 3 卷，第 226—227 頁)我在青年协会就經常听到美国干事灌輸这些論点。事实上，青年会在中国的开展，也完全是根据穆德的这种所謂“战略方針”进行的。

美帝控制下的青年协会

我是一九三〇年夏参加青年协会工作的。当时美国干事經常对我說，青年会和教会不同，因为它完全是一个由中国人独立自主的“本色化”团体。外国干事受中国方面的支配，名义上也都称他們为“Fraternal Secretaries”(可譯作“友誼干事”)。但实际上情况并不是这样。那时协会共有干事二十三人，其中外国干事就有八个，一个是英国人，其余都是美国人。美国干事当中，鮑乃德（E. E. Barnett）是 “Senior Secretary” (可譯作“首席干事”)，他是北美协会的駐华代表，也兼任青年协会的副总干事，因此不但全国三十几名外国干事受他調配，协会的大政方針也是由他控制的。鮑乃德还兼任市会組主任，掌管各地城市青年会的联系。在他的办公室里，雇有一名外国籍的英文秘书，专为他速記、打字，向美国作报告。所有涉及美国干事的档案和經济，都是完全分开的。美国干事的薪金、住宅等待遇都远远超过中国干事；他們除了每年可以到避暑胜地休假以外，每七年还可以全家回国休假一年。在我参加协会以后不久，美国的經济恐慌迫使大部分美国干事被調回国，于是留下的几位都改任区干事，每一个区可以管理两个以上的城市青年会。据說因为他們比較有經驗，所以“服务”的范围可以扩大一些。实际上，这样就可以由少数的美国干事控制更广泛的地区。

过去青年协会使用的語言是英文，无論是开会、談話、記录，或

China

者写信、发电报、写报告，都是以英文为主。許多正式文件，包括青年协会的規章在內，都是先用英文写成，然后才譯成中文的。各个办公室的玻璃門上都将干事的英文姓名油漆在上面。十五位中国干事当中，至少有九位是留美的。凡是出过洋而英文講得漂亮的，就最有地位而且"发展"前途也大。凡受帝国主义分子所"賞識"的中国干事（包括各地城市青年会干事），工作五年以上的，也有留美的机会，一般是被派到美国某一个城市青年会实习或是担任游行捐募工作。

青年协会內部，主要分为市会組和校会組两个部分。市会組是联系各地城市青年会工作的，校会組是联系各地学校青年会工作的。它称为"协会"而不称"总会"，意思是各地市会与校会都是独立自主的团体，全国的机构只起协作的作用。在我参加协会时，全国共有四十一个市会，一百三十三个校会（其中一百一十二个学校青年会，二十一个基督徒学生团契），总共会員人数約五六万人。

中国最早的青年会是学校青年会。一八八五年在福州的英华书院和北通州的潞河书院就有美国传教士所发起組織的学校青年会。一八九五年北美协会派遣第一个美国干事来会理（D. W. Lyon）来中国，先在天津組織一个公立学校校际性的学生青年会。一八九六年穆德首次来华，那时国內还只有五个教会学校有青年会的組識，經他到各地布置以后，在短短的三个月当中，就从五个增加到二十七个。他还把它們的代表召集在上海开会，成立一个全国性組識，当时的譯名是"中国基督学塾幼徒会"，由来会理担任总干事，并立即参加世界学盟作为团体会員。此后，北美协会又派遣更多的美国干事来中国。义和团运动以后，天津、上海、香港等地相繼成立了城市青年会。一九〇二年，市会参加校会的全国性組織

China

并扩大成为"中韓港基督教青年会总委办"。一九一二年十二月，复改称"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組合"，朝鮮青年会則自行組織总会。一九一五年十一月，才改用今名"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

城市青年会的会員一般分为两种：凡已入教的基督徒可以参加称为会員（有时称"同宗会員"）；非基督徒参加的則称为会友。过去各地市会每年举行"征求会"，又把应征的会員根据交納会費的多少，分成更多的类别，如"名誉会員"、"永久会員"、"普通会員"等等。做干事的对于每年的征求会感到头痛，因为在这个时候，就是干事們向資产阶級卑躬屈膝、低头作揖的时候。有的市会在征求会时組成許多征求队，請地方上的官僚和資本家充当队长，彼此竞賽，得分最多的授以奖品。有些大官就在自己的机关里下条子，命令所有属員一齐参加青年会，引起了不少公务人員对青年会的反感。青年会的宗旨，虽然是"发揚基督精神，团結青年同志，养成完全人格，建設完美社会"，它的会訓是"非以役人，乃役于人"，但它的征求会員的制度已經形成了一种庸俗的要錢方式，失去了它所标榜的宗旨和会訓的意义。青年会的干事是由董事部聘請的。但是，每年参加年会选举董事的只限于同宗会員，因而聘請干事的权力就完全掌握在这部分人的手里。一九三二年"美国和加拿大青年会国外工作的調查报告"里說：这样做可以"防止共产党人的渗透和最后的控制"。

青年协会的經济基本上是由北美协会担負的。在我最初参加协会时，据說經济已經"自养"了，那是因为协会大楼房租的收入以及每年从資产阶級和官僚資产阶級所获得的"捐款"已够維持經常的开支；至于許多事工的开展，还是在所謂"Special Projects"（可譯作"特殊事工"）名义下，由北美协会补助。到了抗战时期，在梁小

China

初担任总干事的时代，协会的經費連同許多市会的經費，又差不多是全部由北美协会担負了。

青年协会的董事都是由各地市会与校会在全国大会中选出的，照章每月举行常会一次。大部分董事都是上海的資产阶級分子，他們名义上是来开会，实际上是吃完午飯就走了。总干事提出一些議案，除了有时董事們提出一些无关痛癢的問題以外，无不按照总干事的意見批准通过。每次会議都有美国的首席干事参加，一切討論也都是用英語进行的。

中国的青年会，一方面是世界协会的团体会員，另一方面又是世界学盟的团体会員，但它最重要的国际关系还是北美协会，因此它和北美协会的联系是极其密切的，而且是經常的。一切会議記录和事工报告、旅行报告，都要制成复本寄往紐約，一切重要决定都必須用函电向紐約請示。中国的青年协会，在过去，实質上是北美协会在中国的分支机构。

余日章时代的青年协会

青年协会的第一任总干事是美国人巴乐滿（F. S. Brockman），他是一八九九年由北美协会派来中国的。一九一五年改由王正廷繼任。不到一年，因王正廷去北京充任当时的国会参議院副議长，又改由余日章担任协会总干事，一直到他去世为止。余日章任协会总干事共有二十年。当我一九三〇年夏参加协会工作时，余日章还是总干事，但从他在青年会的活动来說，已近尾声，因不久他的心脏病复发，不能担任实际工作，于一九三六年一月去世。

英美帝国主义分子称頌余日章为 "Patriot, Peacemaker, Prophet"（爱国者，和平使者，先知），并且認为余日章"在任垂二十年，

China

建树极多，使中国青年会蔚然成一伟大运动”。但是从余日章的一生来看，他是美帝国主义在我国传教事业中培养出来的忠心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典型人物。他是湖北蒲圻人，一八八二年出生于武昌，父亲余文卿是美国圣公会的牧师。余日章在教会的培植下，进了当时圣公会所办的武昌文华书院，一九〇〇年义和团运动兴起，余日章全家跟着美国传教士逃到上海租界避难。第二年局势平静，教会其他人員均回武昌，而美国传教士却安排余日章留在上海圣約翰大学讀书。据該校美国校长卜舫济(F. L. Hawks Pott)說：“余日章在学校青年会中，是一員健将”（引自袁訪賚著《余日章传》第 4 頁）。余日章对美国式的軍事訓練发生过浓厚的兴趣，經美国軍官評判，成績特优，給予銀質奖品。毕业后，美国圣公会主教吳德施(L. H. Roots)将余日章調回武昌，在文华大学附中教书。三年后，又保送入美国哈佛大学。一九一〇年底回国，任文华大学附中校长。不久，爆发了辛亥革命，余日章借外国人的力量，在武昌組織紅十字会，从事救护伤亡的工作，因而引起了民軍統領黎元洪的注意，乃被邀协助軍政府办理对外交涉事宜。民国成立以后，余日章到北京参加教育总长蔡元培所召开的全国教育会議，后又参与陈友仁主办的英文《北京日报》的編輯工作。一九一三年一月，余日章被巴乐滿安排到青年协会工作。

余日章开始是担任青年协会“講演部”的主任干事。当时講演部分为教育、卫生、农林、实驗四科，教育科由余兼任，卫生科是美国干事毕德輝（W. W. Peter）担任，农林科是凌道揚担任，实驗科是由美国干事饒伯森（C. H. Robertson）担任。帝国主义分子在宣传方面是善于采用一套巧妙办法的。我在年幼的时候，也曾听过饒伯森在长沙青年会的科学講演，講台上摆滿了各种科学仪器，

China

他在講解无綫电、迴轉仪、相对論时，又講又演，使听众又听又看，借以引起听众的兴趣。他借着科学講演，使人崇拜所謂西方文明与美国生活方式。余日章的教育演講，也是运用各种模型与图表作輔导，他的講題如"振兴教育为救国先务之急"、"人才辈趋于政治一途的非計"、"德智体三育并重"等，都是意在引人走上資产阶級改良主义的道路。

在余日章担任青年协会总干事时代，他曾提出青年会以"人格救国"作号召。这当然不是什么新东西，而是美国青年会为維护資本主义制度而提倡的所謂德智体羣四育的翻版。余日章經常談論中国今日之需要，并不在于海陆軍，也不在于兴办实业，而在于人民的道德，故道德是"需要之需要"。他認为"中国积弱的根本原因在于国民道德的退化，若非从提倡道德改革人心着手，則一切救国的主张皆等于空談"。（見上引袁著第 48 頁）很显然，他是要人們安于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局面，而不要起来反对帝国主义。

青年协会的办事处設在上海当时的"公共租界"。余日章在租界上頗有一些"名望"。一九二二年，上海总商会等团体推派他与蔣梦麟为"国民代表"参加了美国总統哈定所召开的华盛頓会議。一九二五年上海发生"五卅"慘案，英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学生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憤怒；而余日章却为英美帝国主义张目，积极主张所謂"調查"。他和美帝国主义分子罗炳生（E. C. Lobenstine）用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的名义致信租界工部局当局，提出了这个主张。他又从英国邀請何明华（R. O. Hall）到青年协会担任干事，致力于中英間的所謂"和解"工作，企图緩和当时中国人民強烈的反英情緒。他秉承美帝国主义的意旨策动所謂"太平洋国际学会"，挑选买办資产阶級知識分子作代表。一九二七年，他为蔣介石和

宋美龄証婚。后来蒋介石的忠实奴仆黄仁霖成了余日章的女婿，經常作余日章和蒋介石接触的媒介。一九三二年余日章最后一次去美国游說国务卿史汀生，动身以前，蒋介石在南京召見，面授机宜。

余日章时代，青年协会受到英美帝国主义所特别讚揚的有两点：第一，他們說当时协会集中了不少"人才"；第二，协会搞了不少轰轰烈烈的"运动"。青年会本来沒有什么固定不变的工作，过去經常标榜所謂"向前开路"与"适应客观的需要"，余日章就是本着这个需要推行了以下几項所謂："新事业"。他請了晏阳初与傅若愚到协会推广"平民教育运动"。华盛頓会議以后，余日章还請了刘湛恩到协会提倡所謂"公民教育运动"，組織了公民教育运动周和公民訓練所。他企图通过这类运动，来对抗当时蓬勃发展的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一九二二年以后，国内开始了罢工的浪潮，余日章請了朱懋澄到协会搞"劳工工作"，推动上海青年会在浦东設立所謂劳工新村，說是"由此而作改良社会之运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轉移到农村，余日章請了郑維到协会推动各市会大搞所謂"乡村工作"，并于一九二八年与苏州青年会合作在唯亭山举办一个农村服务的試驗場。

青年会虽然不是教会，不做經常性的传教工作，但青年协会却有时組織一些全国性的所謂"布道运动"，穆德和艾迪（Sherwood Eddy）好几次来中国各地"布道"，都是由协会安排的。每到一个地方，通过当地軍閥势力的协助，在較大的公共場所連續"布道"，最后叫人签名参加"查經班"，加入教会。一九三四年当日本侵略我国造成严重的民族危机、蒋介石对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并在其統治地区造成白色恐怖的时候，不少青年感到徬徨失望，协会就由美国干事尚愛物（E. H. Munson）組織所謂"青年与宗教运动"，

China

于是年秋又把艾迪招来中国，跑遍二十一个城市，进行“青年与宗教运动”。据尙爱物說：“新的情况需要新的方案”，在这个“混乱与不安”的时刻，“許多人心怀不滿，被迫傾向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但是，只有宗教和信奉上帝，才能予以滿足。”（見一九三六年二月的英文《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尙爱物文）。

青年会同帝国主义所搞的其他传教事业一样，很早就注意文化工作。一八九五年第一个美国干事来中国以后，在一八九七年就发行了《学熟月报》，后来演变成一九一七年的《青年进步》杂志。这个杂志連續出版了十五年，到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后方才停刊。这一年，潘光旦在青年协会担任“民族卫生”工作，发行了《优生》、《华年》等刊物。不到一年半又停止。在会务报导方面，市会組从一九二一年起，出版《同工》月刊，校会組从一九二八年起出版《消息》月刊。协会自一九一二年起成立的“书报部”又发展成为“青年协会书局”。一九三四年吳耀宗先生担任編輯，出版了《青年丛书》五十种，內容分社会、宗教、修养及两性四类，还有社会問題小丛书与宗教問題小丛书多种。这些出版物，絕大部分是繙譯英美的书籍，而且是有計划地配合“青年与宗教运动”而进行宣传的。

青年会的学生工作

我于一九三〇年七月参加青年协会工作的时候，校会組的主任是吳耀宗。后来吳改任編輯工作，我于一九三五年秋担任校会組的主任。校会組的任务就是联系各地的学校青年会，推动整个青年会的学生工作。究竟学校青年会在过去起了一些什么作用？青年会的学生工作又有些什么內容？我想簡略地談談自己的經历，来說明这些問題。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